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辑



人物纪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六年六月·南昌

封面题字：舒 同

封面设计：徐廷敏

江西文史资料选辑

人物纪略

第二十辑

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江西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西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25开本 3.52印张 字数15万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0.90元

目 录

追忆方志敏同志二三事	正径	(1)
吴先民烈士之死	方志纯	(5)
邵式平同志在晋察冀边区	唐鹤田	(12)
悼邵式平同志	王秉心	(18)
追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挺进纵队”	赵 平	(19)
吉安起义前后的罗炳辉	汪安国	(28)
袁文才与“和平委员会”	苏兰春	(31)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两件珍贵资料	张日新 李祖荣	(37)
回忆李世璋	张履彬 李同力	(42)
追思先父	李鹤鹤	(59)
回忆先师饶思诚	吴自强	(61)
饶思诚同志二三事	杨佐经	(65)
吴迈律师事迹片断	吴威亚	(68)
抗日将军赖传湘	何利亚	(74)
傅抱石先生与故乡	章 琳	(76)
吴宗慈对江西方志编纂的贡献	陈 圣	(80)
欧阳祖经与江西省图书馆	王咨臣	(84)
图书收藏家胡思敬	熊步成	(90)
京剧舞台十秀谈	梁镇国	(93)
记抗战时期的江西建设厅长杨绰庵	罗自强	(102)

我见到的杨绰庵办的“大众食堂” 潘 纯(108)
忆先父余建丞 余俊轩(110)
詹天佑史料拾遗 王季桂(113)

熊式辉在香港的一段寓公生活 杨仲子(119)
王陵基在江西片断 熊正瑞(122)
简忆刘士毅 肖建中(125)
从桂永清谈到国民党海军派系 王振中(128)

沈醉和我 赵秉钰(138)

与蒋经国之间及其它 方家瑜(141)
我在蒋经国手下搞特务活动 刘子洛(151)
蒋经国抓赌余闻 徐浩然(155)
蒋经国在赣县梅林 赣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164)

锤石盘就捕记 陈 达(167)
张延哲先生受害经过 赵秉钰(170)
肖家璧其人 高 田(173)

补 白

“我们革命只杀了两个人” 方家瑜 (41)
增城桥上保卫孙中山大元帅 唐继祖 (4)

追忆方志敏同志二三事

郭正径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曾担任万年县苏维埃副主席，后来，闽浙赣省成立乐河特区，我被调去任财政部长。由于工作关系，我有机会与方志敏同志接触，聆听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教诲。他那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的崇高品质，至今使我难以忘怀。

一

贵溪周坊暴动之后，方志敏同志便亲自来到万年坞头村，点燃革命之火，发动了万年第一次农民暴动，亲手创建了万年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他经常来万年指导工作，在万年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我认识方志敏同志是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间在龙回港下召开的四十八村工农代表会上。方志敏同志亲自主持了那次会议，当时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记得那次会上，方志敏同志向到会代表作革命形势的报告，他声音宏亮，语言风趣，代表们都聚精会神地认真听着。这时，有个代表边听报告边吃花生。休息时，方志敏同志走下主席台，来到那位代表身边，微笑着对他说：

“同志，你吃什么？”

“花生。”

“来，给我点！”

那人从衣袋里掏出一把花生给方志敏同志。方志敏同志接过，往自己的衣袋里一放，又对那位代表说：“这么点太少了，给！”伸手又向他要。那人又给了他一把，方志敏又把花生放进自己的衣

袋里。接着，又伸出手去：“再给！”那人眨着眼把衣袋翻出来，尴尬地对方志敏同志说：“方主席，你喜欢吃花生上我家去，这儿没了。”方志敏同志没有作声，只是点点头，回转身走上主席台，继续作报告。

报告结束后，方志敏同志找到那位代表，拍拍他的肩膀，严肃地对他说：“同志，开会要认真听，不然就听不清楚，不懂革命道理，你怎么去带领群众闹革命！”说罢，他从衣袋里把花生掏出来，一把一把还给那人。那位代表接着花生，心里既激动又惭愧，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许多代表见了，也深受教育。

二

记得裴润元同志对我讲过这样一件事。大约是一九三一年秋，方志敏与爱人缪敏同志，一同来到葛茅坞，方志敏住在艾益清家。艾益清是个秀才，其父是廪生，地地道道的书香门第。方志敏同志很喜欢同这位秀才交谈，同他谈《四书》《五经》，谈中国历史以及当前的革命形势等等。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清乡”，风声很紧，革命根据地正处于白色恐怖中。可方志敏同志不顾个人安危，日夜奔波，筹谋革命大事。他身处险境，临危不惧，使这位秀才对他非常敬佩。那时候缪敏同志身已怀孕，行将临产，方志敏只好把她安置在上葛茅坞一幢看山屋内住；屋里还住了一家避难的群众，名字叫卢雪英。

一天夜里，缪敏分娩了；第二天，方志敏同志探视缪敏同志后，又急忙赶到弋阳去工作，临走时，只好托那位姓卢的妇女照料一下缪敏。据卢雪英说，生下的孩子还吃了她的乳。没过多少天，方志敏又到葛茅坞来了，仍住在艾益清家里。这样，日子久了，方志敏来葛茅坞的事被反动富农裴灯辉知道，他赶到富林报告。那时，富林驻扎了国民党第五十五师梅团长的兵。国民党反动派出动核标队一百多人，赶到葛茅坞搜山，准备捉拿方志敏。

那时，担任万年特区区委的裴延标得悉敌人搜山的消息，立即报告方志敏同志，要他马上离开这里。方志敏同志化装成逃难的农民，与缪敏一道由葛茅坳翻过岭，转到弋阳那边去。

没多久，梭标队果然到葛茅坳来了，他们村村设卡，步步为营，挨家挨户搜索，结果一无所获。方志敏同志化险为夷，继续领导苏区人民与敌人进行反“围剿”的斗争。

三

方志敏同志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革命领袖，他不仅平易近人，还模范地遵守革命纪律。当时龙乐乡苏区人民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件事。那是一九三二年六、七月间，方志敏同志化装成农民从贵溪来万年工作。快到塘坞村口，站岗的儿童团员横着红缨枪，把他拦住：“干什么的？”

“到乡里有点事。”

“有介绍信没有？”

“没有。”方志敏故意考验这班儿童团员。

“那不行！”儿童团员们拉的拉，扯的扯，要把他带到乡苏维埃政府去。唯恐他跑掉，还用红布带子缚住方志敏同志的一只手，押着他向乡苏维埃机关走去。走了一段路，方志敏同志问儿童团员：“你们乡苏机关设在哪里？”

“这你不用管！”儿童团员们回答说。方志敏同志不再问了，跟着儿童团员们来到龙乐乡苏维埃政府机关。

一进门，儿童团员嚷开了：“报告乡苏主席，我们抓到一个可疑分子呀！”乡苏主席不在家，乡里的大师傅从厨房里探出头来，见抓到的是方志敏同志，便跑了出来对儿童团大声喝斥：“你们瞎了眼，这是方主席呀，还不快放掉！”儿童团员们眨眨眼睛，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乡苏主席华达珠从外面走了进来，见方主席被儿童团缚住手，正要批评他们。方志敏同志笑着对儿童团员们说：

“缚得好，你们做得对！”还当场批评那位大师傅。事后，方志敏同志还在一次会上表扬龙乐乡的工作做得好。

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以七个师的兵力，对闽浙赣苏区发动了疯狂的第五次“围剿”（当时在万年驻扎了两个师：五十三师驻大源，五十七师一个辎重营驻富林。），革命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乐河机关被破坏，大部分干部被捕，有的惨遭杀害。我也于一九三五年在弋阳被捕。直到一九四三年出狱后，我才得悉方志敏同志早在南昌英勇就义。噩耗闻后，不胜哀痛。如今，革命已经胜利了，方志敏同志为之英勇献身的革命理想，正在我们面前变成现实。安息吧，方志敏同志！

（万年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增城桥上保卫孙中山大元帅

唐继祖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陈炯明叛变革命，各路革命军奋起讨伐。一九二三年三月间，孙中山大元帅命令滇、桂、粤军各一部，进攻叛军盘据的石龙镇，孙大帅坐花车亲自督战。我军战斗力较差，所以一击就溃。一时间广九铁路线上溃兵如潮水般汹涌，增城火车桥被挤得水泄不通。当时我任滇军独立第十四旅二团八连二排长，在离增城火车桥两华里的地方，发现孙大帅的座车缓缓驶来。眼看大帅的座车就要受阻，我立刻带领二排士兵跑步赶往桥头，鸣枪驱散溃兵，使大帅座车安然通过。不一会叛军追来，我们在桥头竭力抵抗，我排士兵伤亡剧重，我的右脚膝盖也中弹负伤，被送进医院。

第二天，孙夫人宋庆龄带人来院慰问，送我三十块银元和牛奶、罐头等物，并安慰我好好养伤，我深受感动。我住院两月余，伤稍愈，即重返前线讨贼。

陈建军整理

吴先民烈士之死

方志纯

吴先民同志是赣东北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也是我青年时代的亲密战友。他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多年以来，他那无私无畏的精神、坚定乐观的品格和平易爽朗的音容，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一九〇五年九月二日，吴先民出生在江西横峰县青板桥一个贫困的村庄。在私塾破蒙后，一九一九年去南昌考进大同中学。这时

“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席卷着大半个中国。南昌青年学生中进步思想非常活跃。他在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接触了许多进步思想和进步青年。反帝反封建的汹涌浪潮，荡涤着他的心怀，使他的思想在革命的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

一九二四年八月，我在南昌党的秘密机关工作。通过黄道同志，我认识了吴先民。由于我们年龄相仿，思想融洽，志趣相投，每一见面，就从学习到理想，从现在到将来，从省城到家乡，谈个没完没了，渐渐地我们便成了莫逆之交。

一九二五年，上海“五卅”惨案爆发，吴先民立即投入南昌青年的声援运动，积极参加了游行、演讲、写传单等活动。并节衣缩食把家里寄给他的生活费交给“江西沪案声援会”，支持上海工人罢工。

这时在革命的激流中不断成长起来的吴先民，对旧社会有了更加清晰的剖析。他说：“吾名先民，就是先为人民。”决心回家乡宣传革命的真理，宣传俄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他毅然放弃了学习，卖掉自己唯一值钱的一件皮袄作盘缠，离开了南昌，回到家乡参加

了同年七月黄道同志所组织的横峰革命组织——“岑阳学会”，并为该会忘我的工作。一九二六年，经黄道同志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路经赣东北，他在青板桥成立了“农民协会”，发动群众起来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一九二七年初，根据党的指示，吴先民等同志领导农民赶走了反动县官。当时受党的派遣在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工作的“省特派员”邵式平同志委任邹秀峰为县长，吴先民为公安局长。吴先民和邹秀峰同志一上任，就把伪政府推倒，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从此横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起来。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我党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面对敌人残酷的白色恐怖，吴先民受方志敏同志的指示，领导青板桥一带的农民自卫军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八七会议”以后，吴先民出席了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弋阳九区窖头村，由方志敏主持召开的赣东北五县共产党员会议，会议决定在弋阳、横峰进行武装起义。会上他当选为弋横党的工作委员会委员。遵照会议分工，吴先民（化名薛子廷）随方志敏（化名汪祖海）、邵式平（化名余艳王）潜回横峰，他负责青板桥一带武装起义的组织准备工作。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方志敏为首的弋横两县党的工作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吴先民、黄球、钱壁、项春福、吴先喜等同志领导千余名农民革命团员，以青板桥为中心，参加了著名的“弋横暴动”。暴动胜利后，他又积极组织广大农民和“革命团”，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成为横峰人民尊敬的领导者之一。

当时在横峰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
领导共产来革命，都是为穷人。

一九二八年，敌人向弋阳、横峰起义区域大举进攻，因为当时我方军事力量薄弱，缺乏经验，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这紧急关

头，方志敏召开了弋横两县党的干部分会议（即“方胜峰会议”）。会上，吴先民积极拥护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坚持在根据地打游击，与群众共存亡的正确主张，同右倾逃跑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的第二天，吴先民就跟随邵式平同志，带领广大农民武装队伍，配合主力部队，突然出击金鸡山，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举进攻。之后，他在横峰、铅山、上饶等县先后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等职。在这些地方建立地方武装，积极扩大根据地，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在斗争中，吴先民同志曾怀着胜利的喜悦写到：

爆竹燃在煤油箱，
发出声音震耳响；
吓得敌人心胆寒，
赛过当匪机关枪。

由于革命飞速发展，武装力量日益壮大，苏区也逐渐扩大。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先后成立了信江特委和赣东北省委。吴先民均当选为特委和省委委员，并担任过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后调任赣东北赤色警卫师政治委员。在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军创立的战斗中，年仅二十几岁的吴先民立下了不朽的功绩，赢得了赣东北广大军民的尊敬和爱戴。

吴先民同志是一个不怕艰难险阻的人。横峰“岑阳学社”成立，他就主动要求担任《岑阳月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当时为了在横峰县站住脚，吴先民谋得了在岑阳小学教书的合法身份。白天，他既要教课，又要进行其他活动。编写、发行工作一般都是在夜间进行。他常常是通宵达旦，不知疲倦地埋头苦干，从未耽误过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反动派的屠刀很快伸到了赣东北。就在横峰到处缉拿他的时候，他以党的事业为重，不顾个人的安危，来到南昌找方志敏。得到方志敏同志的指示后，立即返回家乡组织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敌人在向弋横起义区发动进攻的同时，利

用新增援的军队，假装倒戈，开到青板桥要求收编。在真相不明的情况下，吴先民亲自前往，不幸被捕。敌人对他施行了严刑威逼，他始终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经援救后逃脱出来）。在后来反击敌人疯狂“围剿”的战场上，他也总是舍生忘死，身先士卒，毫不畏缩。

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吴先民自幼鄙视富豪权贵，贴心劳苦农民。在省城读书时，对穷苦乡邻不摆一点“洋学生”的架子。每次回家，一放下行李就往穷哥们家里跑。无论男女老少，都平易相近。他家的小阁楼，是他和穷苦农民交往的主要场所。他常常把穷弟兄们邀聚在这里，讲李自成、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起义，谈翻身解放的道理，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践。同时，他还经常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帮助贫弱解决困难。后来，虽然他的职位提高了，但他从未疏远过群众。他是一个乐观、活泼、豪爽，喜欢开玩笑的人。每当工作、战斗之余，他就象普通一兵一样，和战士群众打成一片，不分彼此。相邻几个村庄的贫苦百姓都亲切地称呼他“我们的民恩”，把他当作自己的亲人来看待。

一九二八年，吴先民不幸被捕，关押在河口天主教堂。乡亲们得到这个消息后，为他的安危焦急不安，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乡亲们几经周折，终于冒着生命危险，将一把小铁锉放在饭桶里送到吴先民的手中，使他锯断铁窗，得以逃脱虎口。可见他同人民群众的鱼水情谊之深。

他最爱学习。吴先民从小勤奋好学。在南昌求学期间，他对进步思想、革命知识的追求更加强烈，从不放过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时，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不少诸如《新青年》、《新江西》等进步书刊。有时黄道、袁玉冰、方志敏等人在一起谈论问题，他总是在一旁认真地聆听，至深夜而毫无倦意。在担任《岑阳月刊》的编辑工作时，为了把刊物办得既通俗浅显，又富有强烈的斗争性，在紧张的工作同时，他阅读了很多古今中外思想性较强的书籍。后来在革命队伍里，他可以算得上个“知识分子”了，但他从未自满过，随

着革命的发展，对学习抓得更紧了。无论何时何地，在他简单的行李中，总离不开一本书、一个本子、一支笔。他的知识是很广博的。在同群众、战士说话、作报告时，他从不带稿子，一开口就滔滔不绝。见地之高，感人之深，富有很强的鼓动性。听了他的讲话，总觉得心里亮堂。

吴先民同志是勇于坚持真理，敢于向错误路线作斗争的刚正不阿的共产党员。在坚持真理的斗争中，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赣东北根据地和红十军，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领导下，于粉碎敌人对赣东北根据地四次“围剿”之后，和各苏区及兄弟部队一样得到空前的发展。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吴先民同志受赣东北党的委托出席了这次会议。回来后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进行了传达。在这次会议上，我和先民同志久别之后又见面了。他消瘦了许多，但他的精力还是那么充沛，尤其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坚定有神。老战友久疏音讯后的重逢，有多少话要叙啊！但是，这次会议很短，任务很紧，我们只互相握了握手，打了个招呼，就匆匆回前线去了。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了我们的永别。

在这不久，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中央，认为赣东北执行六届四中全会不彻底。批评赣东北党有右倾保守、封建观念、富农路线、调和主义等等，派曾洪易（后叛变）以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来到赣东北。

曾洪易等人到赣东北后，大肆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架空了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同志的领导，改组了省委，竭力排挤持不同意见者。原来的省委委员吴先民、黄道、邹秀峰、洪坤元等同志都被排挤在省委之外。黄道，吴先民等同志和我均被调职。

紧接着，曾洪易又在政治上实行所谓执行“国际中央路线”、“明确阶级路线，打击富农路线”，修改了土地法，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极左政策，在党员、干部、战士中，不问表

现好坏，出身不好的一律视为“异己分子”，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同时还割断了苏区与白区的群众联系。

在军事上，曾洪易认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同志采取游击战争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打击敌人，巩固扩大根据地，是“反对打通中央根据地，是在敌人堡垒面前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邵式平同志军委主席职务。在敌人重兵钳形包围中，发动红军主力，实行硬拼硬打，“持久围攻堡垒”的战略方针，致使我军实力消耗大，处处被动。仅贵溪夏家岭一个碉堡，连续发起四次进攻，部队伤亡甚大，还未攻克。结果不但没有打通中央根据地，敌人第三次全面“围剿”赣东北苏区也未能粉碎，赣东北根据地遭到了不可估量的惨重损失。

对曾洪易等人推行的极左路线，吴先民和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一道，不顾威胁压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因为王明极左路线把持着党政军大权，丝毫没有触动曾洪易等人，反而遭到无情的打击。

此时，适逢中央指示开展肃反运动。曾洪易等人责难赣东北肃反工作不力，把军事上严重损失说成是反革命的破坏，乘机对持不同意见者开始进行残酷打击和迫害。

当时我担任贵、余、万游击司令，一直在前线。因为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我军连连失利，战事十分紧张，我很久未回省委。后来我才知道，吴先民同志被撤去红十军政治部主任和赤色警卫师政委之职后，又被调到前线任一般工作。但他始终任劳任怨，英勇作战。同时，也对曾洪易等人的错误领导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曾洪易等人认为这是反革命派别活动，说吴先民是反革命派别的头子，把吴先民从前线调回横峰予以逮捕。残酷无情的肃反扩大化就这样在赣东北苏区开始了。曾洪易这一做法实际上是拿他先开刀，然后向方、邵等人进攻。

对于这一错误行动，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进行了抵制，说：“反革命虽有，但不致这么多。吴先民等同志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

考验的忠实党员，决不会是反革命。”在省委常委会上同曾洪易等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洪易利用手中的权力，即给方、邵扣上“对肃反动摇”的帽子，并强制方、邵写检讨。

吴先民同志被捕后，仍然坚持真理，对曾洪易等人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曾洪易等人恼羞成怒，用吊打、踩杠子、灌辣椒水对吴先民同志进行严刑逼供，给他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要吴先民同志招出反革命A·B团的名单。吴先民同志始终刚正不阿，不肯屈服。于是，曾洪易等人终于决定从吴先民身上开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曾洪易等人不顾方志敏、邵式平等同志的竭力争辩，瞒着我们前线的同志，在葛源召开的纪念广州暴动五周年群众大会上，给吴先民同志戴上“一贯反对中央，反对省委，在赤色警卫师和上饶县分裂党的反革命AB团骨干分子”的帽子，处以死刑。

党的忠诚战士，赣东北人民的英雄儿子，我亲密的战友，这个在敌人的屠刀下坚贞不屈，在枪林弹雨中勇敢驰骋，乐观无私的勇士，没有牺牲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却在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斗争的枪口下，怀着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含着沉重的冤屈，刚强地倒下了……。这一冤案直到解放后才平反。

让我们永远记取这惨痛的一幕吧！让我们以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党的事业的贡献，来告慰九泉之下冤而不屈的英灵吧！

邵式平同志在晋察冀边区

唐铁田

邵式平同志是我的领导和老师，我和他相识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具体接触不多，但他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我所要谈的是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一年这段时间内，他在晋察冀边区工作的几个片断。

我认识邵式平同志，是在一九三九年春季，在晋察冀边区灵寿县的陈庄镇。那是抗大二分校由陕甘宁边区迁到晋察冀不久，他是二分校的副校长，我是该校四支队的学员。我们四支队在瓦窑堡时已结业，是随二分校到晋察冀听候分配工作的。在等候分配期间，同学们提出要求“吃点偏饭”。领导上答应了这个要求。部分领导干部和几个著名的学者，一起出马给我们四支队讲课，其中就有邵式平同志。他讲的是《马列主义基础》，但只讲完了《武装起义》一个专题。

在听他讲课以前，我们早已听说过他的名字和主要事迹。但是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却是这么一件事。有一天，我在校部图书馆里借书，发现不少书上都有他的名字，写着“邵式平敬献”的字样。仔细看时，凡是这种书上都有他写的眉批、注释、疑问、心得等等。是写在每页的边沿和中间的空隙中的，大都是用毛笔写的小楷和行书，间有钢笔字，密密麻麻、秀丽挺劲。可惜的是，笔迹已经褪色，有些字迹已经模糊不清，可见邵式平同志是很善于学习的。

他讲课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个是逻辑性强，善于引导。在说明道理、摆清情况后，不是由他自己单独地做结论，而是设法引导